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与人际传播

——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陶建杰¹，徐宏涛²

(1. 上海大学 影视学院, 上海 200436; 2.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以对上海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依据, 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发展现状, 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分析其对个人现代性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正处于过渡阶段; 人际传播网络是其个人现代性的培养环境; 人际传播行为是其个人现代性的催化剂。人际传播网规模、传播网趋同性、异质性、人际传播频率和内容等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个人现代性; 人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2010年, 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官方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 使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1]按照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普遍较小, 受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高, 许多人没有务农经历。他们在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城里人接触和互动, 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和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 在城市的归属意识正在形成但尚未最终确立。^[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是中国城乡社会融合的重要趋势。站在农民工的角度考察, 实现真正的融合, 至少需要两个前提: 从外部条件看, 要彻底消除歧视, 城市在教育培训、子女入学、福利待遇、劳动就业及权益保护等领域给予农民工完全的市民待遇; 从内部条件看, 农民工在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身份认同等方面, 逐步建立起“现代性人格”。现代性是一个社会中个人所具有的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属性。具有现代属性的个人常常表现为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 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 也可以表现为具有平等开放、独立自主、乐观进取、尊重感情和两性平等等方面的意识。^[3]但较为遗憾的是, 以往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 多从外部角度关注群体特征、职业取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关系, 而缺乏对农民工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等方面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视。

这一研究取向, 也体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目前新闻传播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两大视角: 一是“媒体呈现”。多采用内容分析法, 分析媒体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结论围绕对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媒介歧视, 污名化、标签化、概念化、刻板印象明显(乔同舟2005; 张诗蒂, 2007; 陈慧, 2008; 许向东, 2009; 等); 媒体建构的农民工形象不完整、不准确等方面展开(陈红梅, 2004; 雷涛, 2005; 张鹏, 2006; 高剑宁, 2007; 王立洲, 2008; 等)。二是“媒体接触”, 一般从接触频率、种类、内容、时段、场所、评价等方面讨论农民工的媒体消费行为

【作者简介】陶建杰(1978-), 男, 汉族, 浙江海宁人,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讲师, 博士
徐宏涛(1982-), 男, 汉族, 陕西西安人,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层次与传播机制研究(10CXW030);
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S30102);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陶建杰，2003；陈静，2008；张雅莉，2008；刘必昊，2009）。此外，还有少数学者从大众媒介对农民工观念的影响（陶建杰，2004；李远煦，王荣根；2009；等）、新媒介技术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影响（丁未，田阡，2009）等角度进行探讨。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大多从外部视角，对农民工与媒介的关系进行粗线条的面上呈现，主要关注农民工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角色缺失问题，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关注很少。此外，新闻传播学界也较少从分化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专门的研究。

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播的效果主要在“信息流”，而“观念流”和“影响流”则往往通过人际传播产生作用。循着这一思路，既然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侧重于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文化精神等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模式上的转变，那么在促成这一转变中，人际传播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农民工进城后的最主要传播方式。^[4]他们通过人际传播实现基本生存、文化和观念、角色和行为、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适应。^[5]此前，学界对“大众传播是促成个人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人际传播与个人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却不多。有学者曾敏锐地指出，人际传播行为对人的现代化影响的研究，仅仅才刚开头，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6]这一点对农民工来说尤其重要。他们经历了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巨变，重构了人际传播行为与内容，在与市民的不断交往中，各种现代的思想观念，深刻地影响到了其中的每个人。因此，研究农民工群体中最易于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与人际传播的关系，便成了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本文以实证数据为依托，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水平和人际传播网络现状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与人际传播的关系，发现影响个人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人际传播方面的主要因素。

二、研究设计

1、个人现代性的测量

著名学者英克尔斯从上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了对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他主要站在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关注的是教育水平、职业、社会流动、大众传播、工厂就业经历等社会因素对个人现代性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个人现代性的12个特征：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变革；能够容纳别人的观点；信息的测量与接受；较强的时间性；工作与生活上具有效能；行为具有计划性；有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有教育与职业的愿望；了解尊严并尊重他人的尊严；了解生产及过程。^[7]应该说英克尔斯等人所进行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尤其是他们首创的研究和测量人的现代化的分析方法。此后，有许多学者运用了“英克尔斯指标”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

由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与西方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想测量中国人的现代性，则需要对“英克尔斯指标”进行调整。在这方面，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的研究令人瞩目。杨国枢对个人现代性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依长度和用途的不同，共有6种）。^[8]在杨氏量表中，最短的“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简短式一成分）有50个题目。尽管如此，在一套问卷中，用50个题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进行测量，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可操作性方面，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选择其中的部分题目，对量表进行缩减。所幸的是，杨国枢已经将现代性量表分为独立自主、内控取向、消费取向、公平正义四个维度。因此，本研究从四个维度中各选取5个题目，考虑到台湾与大陆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差异，以及农民工群体的特点，我们对杨氏量表进行了个别用词用语的修改，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20个题目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量表”（见表1），每个题目采用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五级量表进行测量。

2、人际传播的测量

本研究从自我中心网的角度，^[9]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传播。主要指标有网络规模、网络趋同性、网络异质性、传播强度、传播内容等。

网络规模：指人际传播网络中成员的数目。采用“提名法”获得每个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成员人数，即让每个受访者列举最近半年内与其交流过各种重要信息的总人数。为了研究的方便，总人数限定在1-5人。然后用“提名诠释法”获得农民工人际传播网成员的基本情况。

网络趋同性：自我与其他网络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相似性程度，衡量方法是在某个指标上与自我相同的人数占全体网络成员的百分比。其中年龄趋同性，按照与自我年龄不超过5岁的成员占的百分比计算。

网络异质性：指人际传播网中全体成员（不包括自我）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情况。在本研究中，年龄、受教育年数是连续变量，其异质性用网络成员间的年龄、年数标准差来表示。对于性别、行业等类别变量，用异质性指数表示： $D=1-\sum (P_i)^2$ ，其中 $P=i$ （ $i=1, \dots, K$ ）组中的数目占总体数目的比例。异质性指数的分布从0到1。0表示网络成员间在某个指标方面不存在差异；1表示网络成员间在某个指标上完全不同。在计算异质性指标时，排除了人际传播网规模小于2的个案。

传播频率：以见面为代表的直接人际传播频率；以电话/短信为代表的间接人际传播频率。两种传播频率均分为：“每天都有”、“每周有几次”、“每月有几次”、“大约每月一次”、“少于每月一次”。

传播内容：借用林南对社会行动的划分原则，^[10]我们把传播内容分为工具性传播和非工具性传播。工具性传播指为获得自身尚未拥有的资源而进行的传播。非工具性传播指维持自身已有资源而进行的传播。非工具性传播又可以细分为情感性传播和社交性传播。本研究将“求职信息”、“技能培训信息”、“住房信息”、“健康医疗信息”、“法律政策信息”、“投资理财信息”作为工具性传播内容；将“情感信息”、“子女教育信息”作为情感性传播内容；将“娱乐消费信息”、“衣着饮食信息”、“时事信息”作为社交性传播内容。

3、数据获得

本文所有数据，来自2009年11月笔者对在沪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农民工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散居”（自己租房居住，与市民混居在一起，多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家庭户）和“聚居”（主要分集体宿舍式和村落式聚居两种形式）。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散居”的农民工主要分布于10个中心城区，“聚居”的农民工主要分布于8个郊区。我们选择了徐汇、长宁、普陀、闸北四个中心城区，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选中8个居委会，将各个居委会出租屋登记名单中的所有农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250名。我们又在宝山、嘉定两区，每区各选择了1个农民工聚居村和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名单中的农民工进行等距抽样，抽取“聚居”类农民工250名。研究共抽取样本500名。在500个样本中，成功访问了395人，其中16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符合“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条件的有317人，男性占63.1%，女性占36.9%。本文以这317人为分析样本。

三、统计分析结果

1、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状况

调查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发展水平较高。20个题目中有11个均值在4分以上，3-4分间的有7个，小于3分的有2个。受访者对现代性量表中的绝大多数表述，均持“比较同意”或“很同意”的观点。（2）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发展水平不均衡。标准差大于1的有

表1 各题目均值、标准差及旋转后的现代性因子负荷矩阵

	均值	标准差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因子6
每个人都有权利对国家的重大政策发表意见	4.090	.999	.660	.041	.002	.126	.151	-.100
对于犯罪者应依法进行矫治和惩罚	4.412	.814	.533	.195	.033	.289	.048	-.404
法治社会中, 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应获得保障	4.540	.825	.649	.199	-.089	.142	-.007	.144
社会福利应该有制度来保障, 不能只靠爱心	4.218	.987	.662	.093	-.014	-.133	.080	.276
员工应分享公司的利润	4.185	.955	.509	.291	.283	-.066	-.133	.170
人的财富是靠个人努力, 不是靠命运安排	4.197	.901	.091	.521	-.327	.269	-.023	.211
只要下属的意见是对的, 上司应乐于接受	4.236	.794	.343	.533	.000	.104	.128	-.001
我适应新环境、新朋友没有什么困难	3.705	.931	.200	.416	.182	-.031	.168	.320
亲人犯了法, 应该鼓励他(她)去自首	4.066	.856	.037	.681	-.054	-.061	.187	-.153
只要肯努力去做, 没有做不到的事	3.916	1.020	-.076	.674	-.018	.305	-.116	.220
家中的重大事情, 应夫妻商量后才做决定	4.543	.673	.253	.645	.057	-.053	.019	-.013
人生就应该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	2.985	1.212	.072	-.074	.645	.161	.155	-.005
钱赚了就是要花的, 为什么不过得享受一点	3.290	1.112	-.003	.064	.558	.008	.523	.101
人要努力跟上流行或时尚	3.099	1.077	-.142	.140	.500	.421	-.097	.310
告诉别人自己用的是名牌, 心理上会有满足感	2.478	1.186	.006	-.026	.667	-.049	-.109	-.054
时尚和流行为生活增添了情趣, 是值得提倡的	3.800	.963	.081	-.014	.261	.730	.250	-.065
即使出身贫寒, 只要努力, 仍然可以改善生活	4.516	.746	.354	.250	-.160	.577	-.105	.195
如果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 可以认真考虑跳槽	4.063	.847	.375	-.089	.199	.190	.479	.053
已婚子女不愿生小孩, 父母也不必勉强他们	3.505	1.035	.037	.252	-.115	.019	.798	.098
有挑战性的工作比较令人喜欢	3.708	.947	.186	.058	-.004	.122	.141	.746
可以解释的变质量			12.36%	11.72%	9.02%	7.26%	7.07%	6.20%
全部可以解释的变质量								53.63%

获得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6个因子。由于第6个因子上只有一个题目, 故将该因子剔除, 保留前5个因子进行接下来的讨论。我们发现, 每个因子下的题目, 与杨氏量表中各因子下的题目基本吻合, 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研究采用的超小型量表也具有相当的信度和效度。根据各题目含义并参考杨国枢量表的因子名称, 我们将因子1命名为“公平正义”, 因子2命名为“内控取向”, 因子3命名为“消费取向”, 因子4命名为“开放意识”, 因子5命名为“独立自主”。

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人际传播因素

为了考察人际传播中有哪些因素, 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发展水平, 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进行分析。

模型的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五项因子, 即公平正义、内控取向、消费取向、开放意识、独立自主。自变量是人际传播网络特征(包括网络规模、性别趋同性、年龄趋同性、教育趋同性、职业趋同性、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教育异质性、职业异质性); 人际传播频率(包括见面频率、电话/短信频率); 人际传播内容(包括工具性传播、情感性传播、社交性传播)。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流动时间、流动目的、融入程度(以上海话水平为指标)。

回归结果显示, 性别、年龄、流动时间、流动目的、网络规模、年龄趋同性、职业趋同性、教育异质性、工具性和社交性内容等因素对“公平正义”有显著的影响。男性、外出流动时间越长、以经济型流动为目的、人际传播网规模越大、年龄趋同性、职业趋同性及教育异质性越高、工具性和社交性传播内容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 “公平正义”取向越强。值得注意的是, 年龄的效应呈“倒U型”,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 31岁前, “公平正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但过了31岁, 反而随着年龄的增加下降。“公平正义”模型的总体解释力为24.6%。

性别、职业异质性、见面频率、情感性内容对“内控取向”有显著的影响。女性、人际传播网成员职业异质性越高、和网络成员见面越频繁、情感性传播内容越少的新生代农民工, 个人现代性中的“内控取向”越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网络成员职业异质性和见面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 “内控取向”相应各增加65.6%和23.9%; 情感性传播内容每增加一个单位, “内控

六项。其中对“人生就应该要吃好的, 穿好的, 住好的”、“告诉别人自己用的物品是名牌, 心理上会有满足感”等题目的意见分歧最大。尤其是“人生就应该要吃好的, 穿好的, 住好的”, 标准差最大, 均值却倒数第二, 这意味着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不太认同这一观点, 但群体内部的态度差异明显。所有题目中, 大家对“家中的重大事情, 应夫妻商量后才做决定”最为认可, 态度也最统一。

我们对20个题目进行因子分析, 并用方差最大法对初始因子进行旋转,

取向”则降低30.3%。模型的总体解释力为17.1%。

融入程度、职业趋同性、电话/短信频率、工具性和社交性传播内容对“消费取向”有显著的影响。懂上海话、人际传播网络成员的职业趋同性越低、电话/短信交流越频繁、工具性内容越少、社交性内容越多的农民工，越具有“消费取向”。控制了其他变量，传播网成员职业趋同性和工具性传播内容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取向”分别降低56.1%和12.5%；电话/短信频率、社交性内容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取向”分别提高7.6%、12.8%。“消费取向”模型的总体解释力为16.3%。

年龄、职业异质性、情感性内容对“开放意识”有显著的影响。年龄对“开放意识”的影响，呈U型：一开始，“开放意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30岁后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人际传播网成员的职业异质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开放意识”降低41.3%。情感性传播内容每增加一个单位，“开放意识”增加33.9%。“开放意识”模型的总体解释力为10.0%。

性别、流动时间、人际传播网规模、网络成员性别异质性、见面频率、工具性传播内容对“独立自主”有显著影响。女性、外出时间越久、人际传播网规模越大、成员性别异质性越低、见面频率越少、工具性传播内容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独立自主”意识越强。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人际传播网每增加一人，工具性内容每增加一个单位，“独立自主”分别提高14.8%和15.8%；性别异质性和见面频率每增加一个单位，“独立自主”相应减少70.8%和8.1%。“独立自主”模型的总体解释力为12.8%。

表2 对个人现代性各因子的多元回归分析（非标准化系数）

	公平正义	内控取向	消费取向	开放意识	独立自主
个人变量					
男性 ¹	0.387**	-0.472***	-0.089	0.004	-0.222*
已婚 ²	-0.241	0.154	0.088	0.009	-0.220
年龄	0.374***	-0.032	-0.006	-0.206*	-0.027
年龄的平方	-0.006***	0.001	0.001	0.003*	0.001
教育程度	-0.011	-0.024	0.009	0.029	0.028
流动变量					
流动时间	0.050*	0.001	0.035	0.005	0.046*
经济型流动 ³	0.415***	0.116	0.082	0.075	-0.132
懂上海话 ⁴	0.043	0.214	0.412***	-0.010	0.215
人际传播网规模					
传播网趋同性					
性别趋同性	0.285	-0.236	0.249	0.004	0.181
年龄趋同性	0.601**	-0.181	-0.125	0.314	0.151
教育趋同性	0.315	0.157	0.102	-0.046	0.080
职业趋同性	0.301**	0.103	-0.561***	-0.145	-0.129
传播网异质性					
性别异质性	-0.322	-0.034	0.011	-0.251	-0.708**
年龄异质性	0.021	-0.018	-0.001	-0.005	-0.010
教育异质性	0.683**	0.074	-0.400	-0.193	-0.172
职业异质性	0.198	0.656**	-0.238	-0.413*	0.093
人际传播频率					
见面频率	0.057	0.239**	0.020	0.063	-0.081**
电话/短信频率	0.029	0.031	0.076*	-0.041	0.042
人际传播内容					
工具性	0.104*	0.035	-0.125*	-0.108	0.158**
情感性	0.113	-0.303*	0.209	0.339**	-0.034
社交性	0.195*	0.081	0.128**	0.002	0.070
常数	-6.411***	0.506	0.273	2.763*	0.046
R²	0.246	0.171	0.163	0.100	0.128

注：1参考类别为女性。2参考类别为未婚、离异和丧偶者。3参考类别为非经济型流动。4参考类别为不懂上海话。***p<0.01, **p<0.05, *p<0.1。

四、结论与讨论

1、过渡人格——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发展阶段

从研究结果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在大部分方面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多元现代性量表各题目得分，除了2项外，其余18项均在3分以上，其中更有11项的得分在4分以上，4分亦即持有“比较同意”的态度。但不同方面也呈现级差格局，尤其是“消费取向”的发展程度较低。这意味着，个人现代性的建立，各向度并非处于嬗变和演进的同一阶段，有快又慢。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正处于过渡阶段。

“消费取向”尚未被大多数农民工所接受，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农民工依然位于城市底层，他们的收入不高，且每一分钱，皆为辛苦所得，主要寄回家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至于“公平正义”、“内控取向”、“开放意识”、“独立自主”等向度，与物质基础并无天然的联系，反而更能唤起农民工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因此较受推崇。

新生代农工作为一种过渡人，他们身上有着复杂而矛盾的双重烙印，他们在城市处处存在悖论：分明已经是工人，却要加上农民二字做身份修饰；分明从小生活、工作在城市，却又被视为城市的外来者。我们将他们称为农民工，或者新生代农民工，多少也透着无奈：这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他们或许早已脱离了纯粹的传统世界和农村社会；但远没有真正融入现代世界和城市社会。他们身上体现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双重价值系统”。在这一“双重价值系统”的博弈过程中，现代的、城市取向的价值标准、行为模式、人格特质占了上风。^[11]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特点所在。

2、个体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基础条件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工个人现代性有显著影响。和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接受“内控取向”和“独立自主”。年龄对“公平正义”和“开放意识”的效益，分别呈“倒U型”和“U型”。我们对此的解释是：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他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不断调整着行为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以“公平正义”为例，年少不经世事，或许相信人世间有普适性的公平正义，但随着阅历的丰富，越来越发现，社会和生活是现实的，绝对的公平正义更像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自然而然地，“公平正义”信念动摇了。

教育对个人现代性的显著影响，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我们认为，这并不能抹杀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巨大作用。本研究的样本中，有73.2%的农民工接受教育时间为“12年”（高中或中专、技校学历），其余大部分为9年（初中学历），低于9年和高于12年的很少。样本在学历方面的高度一致，使回归模型无法有效检验学历程度的不同导致现代性方面的差异。尽管英克尔斯也认为教育是一个重要性被夸大的因素，^[12]但无论如何，学校教育带来的团队意识、组织意识、技能训练、规则意识、奖惩意识、学习能力等方面，无疑给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外出流动——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嬗变起点

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仅是劳动方式的改变，更是对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彻底颠覆和更新。社会学家R·E帕克在研究美国城市化过程时注意到，“流动工人最初是掐断了自己同家庭、同邻里的社会联系纽带而开始其流浪生涯的”。^[13]农民工进城以后，与家人、乡邻的交往减弱了，而与市民的交往和联系则增强了。他们便面临着两种地域型人格——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的碰撞。由于都市人格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运动相一致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角色规范等人格特质构成的，所以他们为了适应都市生活，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习得这类人格特质。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相比结婚、投亲靠友、求学、见世面等非经济型流动，经济型流动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接受“公平正义”的观点。懂上海话的农民工，比不懂上海话的农民工，更接受“消费取向”。原因很可能在于：经济型流动的农民工以赚钱为主，在市场经济规则中，“公平正义”具有普适性，也是最能维护他们个人利益的基本原则。懂上海话的农民工，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本人对融入上海的积极态度，成为都市人是他们所刻意追求的。因此，效仿或接受包括“消费取向”等在内的都市人所拥有的普遍社会心理特质，也成为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4、人际传播网络——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培养环境

与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具有更多的互动性、交换性和主动性。新生代农民工人格特质

的发展和变迁、个人现代性的形成，与人际传播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研究结果支持了这种关系：网络规模与“公平正义”和“独立自主”成正比；年龄趋同性和职业趋同性越高，“公平正义”越强。网络成员的性别异质性越高，“独立自主”意识越低；教育异质性越高，“公平正义”越强。职业异质性越高，“内控取向”越强，“开放意识”则越弱。

上述显著关系，都说明了人际传播网络对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的巨大影响。进城务工，走出传统的乡村社会，融入更为广阔的城市社会，本身就是对简单人际关系的拓展和颠覆。人际传播网络越大，人与人之间观点碰撞、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趋同性指标看，性别、年龄、职业相近，使网络成员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异质性指标越高，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人际网络成员的情况越多元复杂，这样就能使自我接触到更多的观念和思想，变得更为积极开放。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呈现“双多元化”。首先，他们的人际圈，突破了农民工群体内部。在本次调查中，人际传播网成员至少有一人是上海人的占22.7%，更有4.7%的受访农民工的提名人全部为上海人。与市民的密切交往，是培养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润滑剂。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突破了父辈那种简单基于地缘、亲缘的“先赋性”人际传播网，更加重视业缘、学缘、友缘等“获得性”关系，从而使人际传播网变得丰富多元。^[14]这种多元的人际传播网，为个人现代性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更大可能。

5、人际传播行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的催化剂

实证研究发现：人际传播行为与人格现代性呈现较多的正相关。人际传播频率中，见面频率越高，“内控取向”越强；电话/短信频率越高，“消费取向”越强。人际传播内容中，工具性内容越多，“公平正义”、“独立自主”观念越强；情感性内容越多，“开放意识”越强；社交性内容越多，“公平正义”和“消费取向”越强。

人际传播频率和内容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个人现代性的催化剂。人际传播能给人们带来更有说服力的关于现代生活的各种信息，容易改变人们的观念，向人们传播新的生活行为模式，并通过“口碑营销”的方式，使新的观念、事物在人群中得到广泛传播，加速了个人现代性的过程。我们可以对人际传播行为与现代性的若干关系进行解释：电话/短信突破了时空限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变得更为随意顺畅，使具有“消费取向”的人们间，有了更多分享信息、互相影响的机会。工具性内容，多与生活就业相关，越注重这些信息的农民工，往往越具有突破传统的想法，愿意“自己出来闯一闯”，而“公平正义”和“独立自主”是闯天下的先决条件。情感性交流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紧张而压抑的城市生活中，得到身心放松的机会和可能也越大。他们经过心理调节后，能以更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激烈的竞争。注重社交性内容的农民工，为了和众人保持良好而持久的社交关系，会自觉而努力的做到“公平正义”，因为这是立足社会的最基本准则之一。此外，社交必然需要一定的成本，越注重社交的人，也就越容易接受“消费取向”。

在中国的城乡社会融合进程中，农民工既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又是率先实现从传统性人格过渡到现代性人格的农民。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对现代化主动追求的积极性也高，他们是“率先中的率先”，是农民中的精英，是沟通城市与农村的桥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发展程度必将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农民现代化，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巨大的变革中，人际传播对个人现代性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下转第108页）

- [20] 孟华：《论互联网的符号特征》，《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
- [21] [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著：《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1页。
- [22] 赵毅衡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
- [23] [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 [24] 李红、董天策：《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召唤——“故宫窃案”的符号学分析》，《新闻大学》2011年秋季号。
- [25]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9页。
- [26]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著：《结构人类学》（第1册），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 [27] [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 [28] [俄]J. M. 洛特曼：《结构主义》，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 [29] [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 [30]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0页。
- [31] [法]罗兰·巴尔特著：《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 [32] 赵毅衡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 [33] 赵毅衡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 [34] [法]罗兰·巴尔特著：《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 [35] [荷]米克·巴尔著：《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 [36] 当行为具有展演的性质，就很明显地体现出符号的特征，比如政治家的很多政治行为都带有明显的符号化痕迹。
- [37] 刘亚猛著：《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 [38] 刘亚猛著：《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0页。
- [39] 《易传·文言》
- [40] 《论语·子路》
- [41] 《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 [42] [法]罗兰·巴尔特著：《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3页。
- [43] [美]阿瑟·阿萨·伯格著：《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 [44] 转引自[美]阿瑟·阿萨·伯格著：《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 [45]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页。
- [46]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
- [47] 转引自黄作著：《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 [48] 孔明安、张羽佳：《精神分析、自我反思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与精神分析的关系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 [49] 李幼蒸著：《理论符号学导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9页。
- [50] [法]罗兰·巴尔特著：《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 [51] [法]罗兰·巴尔特著：《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上接第86页）

参考文献：

- [1] 新华网.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EB/OL].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1/31/content_12907802.htm, 2010-01-31.
- [2]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 63-76.
- [3] 周晓虹. 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 社会学研究, 1998(5): 58-71.
- [4] 徐丙奎.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92-96.
- [5] 陈丰. 从疏离到适应: 进城农民工的文化嬗变[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88-91.
- [6] 陈崇三、孙五三. 媒介·人·现代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92-194.
- [7]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25-31.
- [8] 杨国枢.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本土化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63-417.
- [9] 罗家德. 社会网分析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0-60.
- [10] Lin, Nan. Social Resource Theory [A]. In: E. F. Borgatta and M. L. Borgatta (eds.).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M].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1936-1942.
- [11] 许若兰、许传新. 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7): 19-24.
- [12]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 人的现代化[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96.
- [13] [美]R·E帕克等. 城市社会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32.
- [14] 陶建杰. 农民工人际传播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5): 97-104.